

说人解史

西南联大为何让人热泪盈眶



“这人显然是日本人了。是侵占了北平的日本人，是逼走了我们父兄的日本人，是来进行奴化教育的日本人。玮玮看着这人相当文雅的脸，觉得血直向头上涌。校长一进门，就站在方老师身边遮住她，很快讲起话来。

“同学们，这位三浦健郎先生是来教你们日语课的，他也要和你们做朋友。’校长咳了一声，现在北平的日语教师还不多，我们是第一批开日语课的学校。三浦先生提议早点来认识你们。’他再想不出话讲，便伸手请日本人讲话。日本人高兴地向前走了一步，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了一番，大意是：日本是个很小的国家，可是力量很大，和中国亲善的愿望很坚决，我知道，这是全北平的最好学校，学生都是聪明少年。诸位年轻朋友一定要学好日语，好一同合作。他并不趾高气扬，可是他深信自己国家的力量。骄傲的眼光直看着同学们，大有主人翁态度。

“教室里死一般安静。同学都低着头。他看了一会，转身出了教室，校长等人也跟着出去。同学好半天还因为羞耻不愿抬头。”

《野葫芦引》主人公之一的澹台玮，一个英俊少年，离开北平，就是因为难以忍受上学途中，要经过一个日军哨岗，哨岗上贴着一圈告示，斗大的字，写的是：“每天清晨中小学生过此岗必需向皇军一鞠躬。”书上写道：“玮玮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：不惜一切代价逃脱这种耻辱。”

到昆明去！到昆明去！

三

到昆明去，道阻且长。

小说《南渡记》中的路线是：从天津乘船，途经上海、香港和越南的海防、老街，到达昆明。这也是邓稼先当年的路线。但与西南联大联系在一起，是著名的“文人长征”。

1937年11月1日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，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。战火迅速蔓延，长沙连遭日机轰炸，1938年2月，长沙临时大学分3路西迁昆明。1938年4月，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从长沙到昆明，当时有3条路线：大多数教师、家属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，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，乘火车入滇；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，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，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、南宁、镇南关进入越南，转乘火车入滇——这一路人数最多；而最艰苦的一路，便是由湖南出发，徒步行走到昆明的“湘黔滇旅行团”。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，配有4名军事情官及队医等。他们跨越湘、黔、滇三省，翻过雪峰山、武陵山、苗岭、乌蒙山等崇山峻岭，步行3600里，历时68天。

文人长征，自古未有。虽名“旅行团”，但绝无旅行之悠闲。史载，“湘黔滇旅行团”出发之前，每人发给军装一套，绑腿、草鞋各一双，油布伞一把，限带行李8公斤——主要是路上必需的生活用品。这批读书人脚踏草鞋，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。头几天还有人打伞，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

从“筷子哲学”看中国智慧

“简单至极的筷子，灵活多变的筷子，吃遍天下无难食的筷子，两根筷子学问大。中国人发明筷子，表现出一种思维天才；出神入化地用筷子，又体现了中国人化繁为简、变难成易的高超智慧

北民间有此说说，录以备考。

筷子之妙，在于它能以不变应万变，代表了中国人化复杂为简单的哲学智慧。所谓一双筷子，就是两根小棍，一头大，一头小，现在的标准长度不过二十五六公分，却能应付成百上千种中外菜肴。满汉全席有二百八十多道菜，一双筷子也可以轻松解决。西方人吃面条时，笨拙地把面条在叉子上绕来绕去，然后才能慢慢吞吃到嘴里，中国的3岁小孩都觉得洋人在这方面简直笨到姥姥家了。

新华每日电讯

10版

2018.1.26

时事走廊

关山远

电影《无问西东》热映，4代中国读书人的故事，感人至深，尤其是西南联大一段，尽显国家民族危难时刻，中国读书人的血性与风骨。

1938年4月，昆明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。这是一所只存在了8年多时间的大学，却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。80年过去了，提起“西南联大”，国人依然百感交集，热泪盈眶。

一

看《无问西东》，第一次感觉心脏受到撞击，是“静坐听雨”一段：昆明的骤雨打在教室的铁皮屋顶上，声若雷鸣，教授一次次提高音量，学生们仍然听不见。教授索性在黑板写上4字“静坐听雨”，然后坐下，肩头已被渗透下来的雨水打湿，他就那么坐着，眼神恬淡从容，看着满屋青年学生。

这是抗战年代中国读书人的真实写照：无畏日寇猖狂，不惧环境恶劣，以浩然正气，护中国文脉。

电影中写下“静坐听雨”的教授，原型是西南联大经济学教授陈岱孙，他素以上课“准时”著称，往往是讲完最后一句话，下课铃声响了。有一次他还没讲完，下课铃声就响了，后来发现：是校工敲错了。但是在西南联大，环境简陋，一旦下雨，他讲课的节奏就会被打破。简陋还有另外一个“副产品”，任继愈在《我敬爱的陈岱孙先生》一文中回忆道：“陈先生讲课认真，以身作则，给同学作出榜样，同学们听课从不敢迟到。个别同学去迟了，不好意思进教室门，就站在教室窗外听讲。好在西南联大的新建校舍有门窗而无玻璃……站在靠近讲台的一端听讲，比坐在后排还听得清楚，只是没有扶手椅，记笔记不方便。”

铁皮屋顶后来也没了：经济越来越困难，西南联大只得把以前的铁皮房顶卖掉来维持运转，全部改造成了稻草屋顶。一下雨，教室漏得厉害，学生们只好打着伞上课。但能打着伞上课也还算不错了，日寇飞机频频前来轰炸，师生们只能躲到山间，这是何等之悲愤：虽然偏处西南一隅，仍然避不过侵略者的炮火。但敌人再猖狂，又能怎样？即使在躲空袭的间隙，师生们仍在上课。《无问西东》中有这样的镜头：在昆明乡间的山沟里，浑身泥泞的师生，仍然能够从从容地上课，地质学、哲学、文学……当敌机轰鸣而过时，陈楚生饰演的吴岭澜，在大声为学生朗诵泰戈尔的诗歌。

但凡知道一点中国历史的，看到这个镜头，怎不难抑热泪？这样的中国人，岂是能够被打倒的！

今天回想起来，当年云集在昆明的那一代读书人，确实践行了先贤孟子所言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。他们原本是大城市名牌大学的著名教授，生活优渥，身份尊贵，住华屋，有听差，来到昆明，居然会遇到“饥饿”这个难题。当年，在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里，朱自清饿得无法入睡，一人孤独坐着。他的日记中，常有“胃病发作”“胃痛，抽搐”“每日呕水”等文字。1941年3月8日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本来诸事顺遂的，然而因为饥饿影响了效率。过去从来没有感到饿过，并常常不知饥饿为何物。但是现在一到十二点腿也软了，手也颤了，眼睛发花，吃一点东西就行。这恐怕是吃两顿饭的原因。也是过多地使用储存的精力缘故。”

物理系教授吴大猷的家，遭到日机轰炸，最让他心疼的是缸里的面粉掺进了很多碎玻璃和泥沙，只能用水冲洗，做成面筋。为了给妻子补充营养，他常常去菜市场捡些牛骨头，回家熬汤。在最窘困的时候，他甚至养了两头小猪，计划到年底卖掉换些钱……

教授家长们也早就告别了养尊处优的生活，为补贴家用绞尽脑汁，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做糕点——上海式的米粉蛋糕，取名“定胜糕”，做好后挎着篮子，步行45分钟到“冠生园”寄卖，由于路走得多，鞋袜又不合脚，把脚磨破，感染了，小腿全肿起来……

著名作家宗璞是哲学家冯友兰的女儿，抗战时期随父亲赴昆明，就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。她写的《野葫芦引》的多卷长篇系列，细腻描述了当年西南联大的生活。第二部《东藏记》，取名“东躲西

“回首抗战岁月，中国的大地上，由东向西，真是一场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大迁徙，这其中有无数的读书人高昂着头颅、挺直着腰板在行走。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过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大转移？世界上有哪个民族遭受过这等苦难？世界上又哪有过这么一群读书人，把大学当作捍卫国家荣誉与民族精神的第二战场？

藏”之意，还原了当年在空袭之下西南联大师生清苦而又丰富的生活，比如在一次空袭中，物理学教授庄寅辰被炸弹掀起的泥土埋住了，还始终紧紧抱着实验仪器。书中有这么一个细节：几个从北平随父母来昆明的少年，得到了一次吃西餐的机会，孟庸（原型其实是宗璞本人）“把面包切成小块，仔细抹上黄油，一小口一小口吃”，请客的仇俊雷说：“照说，人都受环境影响，可你们无论环境怎样坏，总有一种清气，或说有一种清贵之气，很奇怪。”玮玮（澹台玮）沉思地说：“虽然吃的是八宝饭，我们却处在一个拥有丰富精神世界的集体中，那力量是很大的。”

这个“丰富精神世界”，是西南联大独有的气质。纵然国破家亡，但始终有一群人，在守护着中国的文脉，这支文脉不断，中国就不会亡。

二

他们不得不离开北平。

有一位教授，名满天下，“七七事变”后，他的父亲绝食而亡，“他觉得自己老了，不能去保卫祖国，国家沦陷，他不能承受如此耻辱”。他给父亲办丧事的时候，日本宪兵队找上门来，请他去做客。日本人正在找人来为华北伪政府撑门面，比如周作人。但他不是周作人，他没等父亲出殡，就悄然离开北平，往西南而去。这个教授叫陈寅恪，国学大师。

有一个少年，看到日军在北平沦陷后举行“庆功会”，怒不可遏，当众把一面日本膏药旗撕得粉碎，并扔在地上踩了几脚。他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美学教授，知道儿子此举必将引来日军报复，不得不把他送出城，南下昆明，临行前，他告诉儿子：“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，不要学文，科学对国家有用。”这个少年叫邓稼先，若干年后的“两弹元勋”。

那些想尽一切办法离开北平的人，不甘心在日军铁蹄下生活，更不甘心成为日军毁灭中国文化的帮凶。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是妄图摧毁中国之文脉，让中华民族“亡国灭种”。日军每攻占一个城市，均有计划摧毁和破坏中国文化：焚毁出版机构、破坏大学、占领学术机构、劫掠图书文物、残害知识分子……北平当时是中国的文化中心，沦陷后，日寇对北平的文化机构尤其是大学进行了疯狂破坏，《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》一书显示：北平沦陷期间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燕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……均遭洗劫。

清华大学成为日军的兵营和伤兵医院，学校设施、仪器设备、图书均遭受洗劫，体育馆被用作马厩和食物储藏室，木地板全被拆毁，更有甚者，新南院竟成了随军妓馆；北大沙滩红楼沦为日军宪兵司令部，多位留守教职工遭受严重身心折磨，最为恶劣的是，日军劫掠北大图书馆馆藏珍品《俄蒙界线图》，这一孤本文献，迄今下落不明……

日军在侵占的城市，大肆推行奴化教育，宗璞《野葫芦引》系列小说第一部《南渡记》，就写了“七七事变”后日本人在北平各中小学强行推行日语教育的情景：

“这时教室门开了，校长、教务主任陪着一个穿浅色西装的男子走进来。

湛，有铜有银有金质。唐代以前的筷子，形状基本为圆形，两头细，中间粗。到了明代，筷子的形状基本成为首方足圆，筷子的脑袋由圆变方以后，放在饭桌上就不再乱滚乱跑了，人们用着更方便了，更妙的是能工巧匠们可以在上面大展才艺了。筷子的方头虽然面积不大，但工匠们可以刻字雕花，什么福禄寿喜、龙凤呈祥等等。这一来，筷子既是生活实用品，又是工艺美术品，看着漂亮，用着舒心。现代筷子的形状和用材，已经百花齐放，千奇百怪了。

感谢智慧非凡的老祖宗，为我们创造了筷子这个看似十分简单，其实变幻无穷的东西，有了它，中国人就可以吃遍天下无难食。老外们看中国人用筷子能吃各种饭食，觉得不可思议，我们中国人却认为这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，因为我们中国的傻子都会用筷子，所以反倒对老外们的不可思议感到不可思议了。

观察筷子的制造技艺，琢磨中国人出神入化用筷子，是了解研究中国智慧最直接最有趣味的切入点。

筷子本来是吃饭用的家伙什儿，但中国人却能把它变成政治工具。据说，历代帝王都用象牙筷子。如果谁给皇上的饭里下了毒，用象牙筷子一试就能发现，因为象牙筷子遇到砒霜之类毒药，立即就变色发黑了，饭菜里是否有毒，一目了然。这事靠不靠谱，咱既没当过皇帝，也没当过大监，无法知道。西

四

《无问西东》中令人热泪长流的一幕是：王力宏饰演的富家子弟沈光耀，驾机撞向日舰。

今日南京中山陵还有一座“航空烈士公墓”，其中有多名西南联大的学生。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回忆》一书中列举了多名烈士的英名：“戴荣征，1943级地质系，1944年6月在长沙与敌机作战时殉国；王文，1944级机械系，1944年8月在保卫衡阳战役中与敌机作战时殉国；吴坚，1944级航空系，1945年初在陕西与日寇飞机作战时殉国；崔明川，1944级机械系，1943年在美国受飞行训练时，失事撞山殉国；李嘉禾，1940年转入物理系二年级，1944年在美国受飞行训练时，不幸失事殉国……”

史载，在西南联大历史上，曾出现过3次学生从军抗日的热潮：第一次是在长沙临时大学期间，众多学生作为技术人员加入机械化装甲兵团，其余学生去了战地服务团，一批学生还去了延安抗大学习，他们在八路军大显身手，制造地雷炸药，甚至还造出了土火箭，可飞150米；第二次是随着来华美军增多，西南联大学生纷纷报名担任翻译人员，其中包括梅贻琦的儿子梅相彦；第三次是中国远征军组建期间，联大学生被送到印度蓝姆加当汽车兵，驾车活跃在史迪威公路上。

除了3次大规模的从军活动外，也有部分联大学生零星自发参军的。1946年5月，西南联大回迁前，在联大新老校舍即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东北角竖立了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”，纪念碑背面为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》，总计834人，后人亦称之为西南联大“八百壮士”。碑文上写道：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战时任务完成学校结束之日，勒其从军学生之姓名于贞石，庶垂令闻，及于久远。其有遗阙，补于校志。”

《野葫芦引》系列第三部《西征记》，写的就是联大学生从军与残酷的滇西之战。第一部中的英俊少年澹台玮，在这一部已经是英武青年，他参军成了一名翻译，为了架设通讯线，攀上电线杆，被敌人射中，最后在缺医少药的野战医院中溘然长逝。

澹台玮之死，最令人伤感，很多读者读到他的牺牲一幕，都掩卷长叹：“我们的玮玮死了……”他是宗璞笔下最优秀的男子，中西合璧式教育培养出的优秀青年，家境优越，为人善良谦逊，在生物学领域很受教授器重，前程大好，类似《无问西东》中的沈光耀。沈光耀是愤怒于日机的暴虐而毅然违背对母亲的承诺，加入空军；澹台玮参军，是梦想着能够打回北平老家，把那些逼着中国孩子鞠躬的“皇军”从家乡赶走，但是，他永远回不去了。

“没有足够的食粮/且使我们的鲜血去/没有热情的安慰/且拿我们的热血去/热血/是我们唯一的剩余……”这是联大经济系学生缪弘的诗作《血的灌溉》，他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，用自己的鲜血灌溉了祖国的大地。1945年7月底，他作为伞兵部队的一员，参与了收复广西平南县境内丹竹机场的战役，8月2日伞兵部队占领军事要点，全面打败守敌，收复丹竹机场。但在8月4日的一次战斗中，缪弘手持卡宾枪冲锋时，被敌人狙击击中，不幸牺牲，年仅19岁。11天后，日军投降。

缪弘与哥哥缪中均是联大学生，同时从军抗日，被传为佳话。令人感慨的是，他们的父亲缪斌，却是著名的汉奸，抗战胜利后被枪决。兄弟二人当初报考西南联大时，在报名表上改掉了父亲的名字，才得以顺利录取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，西南联大的那一代中国读书人，赶上了一个最糟糕的年代，但正因为有些无法选择，在民族大义之前，更能做勇敢的选择。无问西东，只循内心。如同缪弘《血的灌溉》之结尾：

“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/你/我/谁都不曾忘记。”

向那一代中国读书人致敬，如此真实，如此血性，如此元气淋漓。

生活简史

申尊敬

筷子这东西，我们从认识爹娘时就认识它，熟悉得几乎和自己的爹娘父母一样。我们学吃饭，都是从父母教我们学习拿筷子开始的。一日三餐，炎黄子孙们每日每餐都离不开筷子。离了筷子，中国人就没法吃饭了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只要手里有一双筷子，上了饭桌就“万物皆备于我”了。无论餐桌上的食品是方的圆的、大的小的、长的短的、软的硬的、煎的炒的、煮的炖的、生的熟的、稀的干的、热热的凉的、带汤的不带汤的，中国人都能轻巧灵活甚至不失优雅地把它们吃进去，实在夹不起来的東西，咱用筷子刨也能把它吃到肚子上。

中国人用筷子吃饭的历史漫长而悠久，已经有4000多年了。据说，筷子的发明是大禹治水的副产品。相传当年大禹治水时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都在野外进餐，有时猪肉刚烧开锅，大家就急欲进食。但是锅里的汤水滚沸，无法下手，人们急中生智，就折树枝夹肉或米饭食之，这就是筷箸的起源和最早的雏形。

人们发现，用筷子吃饭，既不烫手，又不沾油腻，便纷纷仿效。南方多竹，北方多木，最初的筷子多以木竹为原料。在距今3000多年的商纣王时代，我国已经出现了十分精致的象牙筷子。自汉到唐，人们制作筷子的用材越来越广泛，技艺越来越精